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

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
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姜
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

——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姜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
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 姜萌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261-1

I. ①族… II. ①姜…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4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

——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姜 萌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1261-1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定价：76.00元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3XNJ021，项目名称：族群、革命与现代化——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学。

序一

王学典

姜萌的书稿《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即将付梓，请我为之作序。作为其老师，自不能推卸。

自本科上我的课起，此后读硕、读博，姜萌随我读书近十年。还记得是2002年，那是我最后一次给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上“史学概论”课。某一天的课间，一个还有些腼腆的学生拿着几页稿纸找到我，说是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后的感想，请我指导。这篇所谓的“书评”，虽不乏稚嫩却充满锐气，读后颇为所动。这个学生就是姜萌。后来姜萌跟着我读硕士、读博士，我对他的了解遂逐渐增多。性格虽有粗糙和急躁的毛病，但热情坦诚、朴实守信；治学的禀赋虽不算太高，但非常勤奋，且勇于思考。姜萌的这些特点，如果用心读他这部书稿，应该会有所感觉。

这本书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姜萌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中，有这个工作做基础，我对他的博士论文并不担心。不过在看到论文初稿时，我并不太满意。后来姜萌告诉我，我在他的预答辩现场，说过的一句话刺痛了他：“这篇论文对一个想拿学位的人来说绰绰有余，但对一个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说他当夜几乎一眼未合，并做出一个冒险的决定，推倒重写，哪怕写不出来而延期毕业。我对他这个决定多少有些担心。担心他不能顺利毕业，但也期待他在高度压力下能迸发出更强烈的学术创造欲望。听说他为了重写论文，年三十下午才去岳父家，年初二早上就回到学校。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回报。当我再一次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多少有些吃惊，没想到他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对论文进行了如此大幅度的重写，论

文的质量也自然有了不小的提升。在他博士论文的鉴定报告中，我写下了比较肯定的评语：

此文在清末史学的研究上贡献了一系列开拓性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书写模式与族群意识的高度相关关系。在作者看来，有什么样的族群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书写。应该说，对族群观念与历史书写的相关性关系的揭示并不始自本文作者，但对此一关系揭示的如此透彻和清晰，则是作者的贡献。就本文所研究的领域而言，本文可以说把对清末史学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此文对清末三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概括和清理，使人们看清了一百多年来占主流地位的历史书写模式的起源，这也是此文对清末史学史研究的又一贡献。全文设计合理，结构匀称，资料丰富，论述扎实，思路清晰，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写作规范。本文比较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汉族史”书写与“地方史志”书写的现代性揭示的不充分，不能尽释读者之疑。

在姜萌的毕业答辩会上，各位答辩委员也都认为，这篇论文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说颇具探索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尽了一个青年学者之力。

姜萌博士毕业后，获得了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职，决定北上入都。对于这个决定，我比较矛盾。从他个人学术前景的角度，我认为他应该像一只已经长成的鹰，独自去搏击长空，遨游世界，他也告诉我一直在山大念书，视野不够宽广，想出去看看。但从生活的角度，彼时他在济南已有家室，妻子有稳定的工作，房车兼备，生活不错，进京工作不仅意味着要抛弃这一切，重新开始，还要面临解决妻子工作等难题，注定要吃很多苦。且从我个人需要的角度，姜萌脑子快、腿脚勤、有办事能力，能帮我处理一些杂务，不太情愿放他走。记得当时关于到底进不进京，他和我商讨了几次，最终还是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决定抛弃既有生活，北上就职。

任教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姜萌时常会联系我，偶尔也在济南或北京见见面。他和我谈得比较多的，是他在京工作生活的压力，诸如上课太多，住所不稳定等，也谈一些收获，诸如遇到的相处很好的同事学友，朋友帮忙解决了妻子的工作等。我感觉到，他虽然在北京吃了些苦，但总体的精神状态是欢愉的、向上的，学术研究也在按计划向前推进。对他的挂牵，遂逐渐放下。

由姜萌的这些经历，这里我想就学术新人的培养问题谈点浅见。文史哲这些积累性很强的基础学科的发展在当下正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传承危机，是许多人所感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至少有这样两个，一个是招生培养的机制问题，一个是青年教师成长的环境问题。

姜萌在一个聚会上说，他是最让我费心的一个学生。就上学这件事来说，这句话没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姜萌的英语基础不好，尤其是不善于应试，以至于他的读硕、读博之路相当坎坷曲折。硕士努力两次，博士也努力了两次。姜萌上本科是以第一志愿考取山大历史系的，本科期间堪称刻苦读书，勤于思考。我敢说，绝大部分在本科期间给姜萌上过课的老师，无不认为姜萌是一个做科研的苗子，但现有的招生机制却一再把他的阻挡在继续深造的大门之外。本科毕业，姜萌的专业课非常优秀，已在所谓的 CSSCI 来源期刊刊发了不错的论文，但因为英语四级不是第一次通过，于是失去了保研资格，不得不去应考。第一次考研因为距离英语统考过线差 2 分而失败，为了谋生去了山东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再考才通过。上了硕士后，我就很担心他应考英语的能力，就向学校研究生院申请了“直博”的机会，可惜审查资格时，因为他尚未通过英语六级而失败。2007 年春，姜萌第一次考博士，英语总分超过录取线 8 分，却因为英语写作差 2 分而名落孙山。后来姜萌告诉我，2007 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刚刚结婚，一事无成，不工作的话生活都成问题，工作的话又不能保持连续的英语复习，可能还考不上。后来他决定辞去报社工作，全力复习。为此，我给他在学校找了一间办公室。进入冬季后，因为种种原因，他决定回豫南山区老家去复习。我是在他已坐上回家的火车上，才接到他的短信，说是已在回老家的路上，并问我，他是真的有研究学问的潜质吗？很显然，生活的重压已动摇了他学术研究的志愿。后来姜萌告诉我：他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在家人面前的，父亲醉酒后的言行再一次戳伤了他；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不能抑制的悲伤，在阴冷的房间里去更努力复习他早已憎恶的英语；纷纷扬扬地下了近一个月的雪，让他的情绪愈加低落；有一天早上，鲜红的尿液，染红了一大片雪，压力、压抑和艰苦的条件，显然已让他的身心濒临崩溃的境地。好在后来他又回到济南，准备继续考试。尽管准备了大半年的英语，可惜英语还是差两分。最后我向学校申请降分录取，姜萌才算读上了博士。

在山东大学，我已有带硕士 21 年、带博士 17 年的历史，越来越觉得我们当前的研究生招生培养机制存在着一刀切这样一个较大的问题，也就是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一个刚性标准来面对才性各具的学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现有的机制在保证大致公平的同时，也扼杀了不少有突出个性但并不完美的青年的学术生命。假如学校不对姜萌施以一次次的援手，假如姜萌不是一次次的坚持，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颇有锐气的学术新人姜萌吗？我们现在的人才选拔机制甚至还远不如民国时期，当年吴晗以数学零分入读清华大学、臧克家以数学零分入读山东大学，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还有可能发生吗？天知道，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究竟扼杀了多少个吴晗和臧克家！在文史哲这些领域，可能不知道有多少导师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想招的学生招不了，不想要的学生不要不行。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当然比较复杂，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认识，并且当作一个已经严重制约了学术发展的因素来认真对待，——假如文史哲这些冷门的、收入最低的学科的学术后继者们大多数都是些没有天分、没有兴趣，只是当作吃饭的饭碗的人，学术还怎么传承发展？

当前制约学术新人成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体制环境。据我有限的观察，当前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的学术新人，相当大的比重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子弟。一方面，他们念了多年的书，基本没有收入，工作后差不多都是三十左右，立即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多数机构都不能解决住房，哪怕是筒子楼、周转房，菲薄的收入和高企的房价、房租让一些没有家庭后盾的青年教师不得不分心挣钱。另一方面，目前不少高校在职称晋升方面均有名额的限制，而不是说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要求后就可以顺利晋升，这使一些本该晋升的青年不能晋升，而不晋升收入就上不去，这不能不挫伤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站在青年教师的角度，遥想当年傅斯年执掌史语所时，入所的新人每月薪水一百多块，前三年不让发表论文等规定，从而给青年学人营造了一个可以衣食无忧、凝神静气潜心读书治学的环境，真是令人羡慕不已。

拉杂写了这么多，最后再回到这部书稿上。相较于博士论文，书稿有了不小的改动，尤其是绪论、结语等部分。关于书的内容，我不准备花费太多笔墨。因为用“族群”、“国族”等概念取代“民族”概念，从而将注意力放在现代历史书写模式的特点、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之关系、历史书写如何处

理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等学界探讨还比较少的方面是否合适？姜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最后有多少能被学术界接受？我现在还无法判断。我想，即使大多都不被接受和认可，倘若读者能够秉持是其是、非其非、是其所以是、非其所以非的态度，来思考姜萌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回答，也不能不说是这部书稿对学术研究的推动。

是为序。

序二

李振宏

姜萌博士的学位论文《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即将出版，约我作序，尽管我不很自信，但还是欣然应允了。姜萌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我都参与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年，答辩的具体细节都已经模糊，但对这个年轻人的基本印象还是非常深刻。诸如他的论文的深刻性，思路的清晰，文笔的流畅；他做事的干练、利落，为人的忠诚、热情，谋事的严谨、周密，等等诸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总之，我觉得这是个基本素质非常优秀、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是我所遇到的很少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青年才俊之一。为他作序，与有荣焉！

是书选取族群意识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分析考察清末最后几年中国史学的编纂状况，所研究的课题从属性上说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史范畴，是一本实证性的著作，但其意甚深。因为作者的立意并不在于对清末历史书写模式的考察或描述，而在于通过对其撰著模式的分裂性分析，提出一个即是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解决而值得思考的理论性问题，即通过经验史学的考察，提出一个如何处理历史书写中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关系这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大问题。作者说：

一部优秀的中国通史著作，应该在认知与认同两个方面有非常自觉的追求。所谓历史书写的认知追求，主要是指书写者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知识的不断发现与占有，是学术“求真”的表现；历史书写的认同追求，主要是指书写者对历史事实再现过程中方方面面情感的不断理解与掌握，是学术“致用”的考量。认知是认同的基础，认同是认知的升华。只有二者有机融合，历史书写才能被广泛接受，才能穿透时光。

作者认为，以往历史书写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不相融洽，亦即历史研究中经常碰到的求真与致用的分歧。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历史书写面对的这些棘手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造成历史书写存在这些棘手问题的根源所在；而只站在现代语境中书写历史，就正是造成当前现代中国历史书写存在种种问题的根源。即现代历史书写总是从现代的观念（政治、疆域、文化等方面）出发去重构过去。

但是，历史学家是现实中的人，他和其他任何社会成员一样，思想观念来源于现实，问题意识产生于现实，吃的现实的饭，穿的是现实的衣，他这个“人”本身就是现实的作品，如何可能不从现代的观念出发去重构过去呢？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现实性就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所无法逃遁的属性。其实作者也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即使是对现代历史书写持有最尖锐反省能力的人，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具备现代观念意识的现代人书写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摒弃现代观念意识。”但是，作者还是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有机融合，历史书写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是尽可能完全摒弃现代观念意识，而是对现代观念意识对其历史书写的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力求‘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同样的问题，历史学家无法摆脱现代观念，怎么能做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呢？作者说：

所谓“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是指历史书写可以尽量摆脱现实的考量，尽量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重建历史场景。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并不是刻意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仅仅提倡“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高度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对历史书写影响之结果。“书写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在本质上……忽视了“今”与“古”的边界。要实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就必须对“今”与“古”的边界、历史与现实的勾连有清晰的认知与高度的警醒。

其实，这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只能是历史书写的理想性追求，而不是一个可以经验的问题。即便是我们的历史学家都真诚地主张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而不同历史学家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也是不同的，这就又牵涉到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历史认识论研究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是一个无解的怪圈。

那么，是不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

历史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见仁见智、富有思辨性而不可能有绝对性结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的价值大概就在于考验或磨炼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提出许多方面的思考，而最终的答案依然不可能清晰。历史认识中的“古”与“今”的边界就是这样，从现实出发和“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也是这样。这也就是作者感受到“至于如何实现‘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很难实现，或者说绝对的实现根本就无可能。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吗？或者说我们就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吗？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历史认识的检验，我提出过“历史之真”（即本体性的历史存在本身）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这个检验标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绝对实现其操作性，但又不能舍弃的标准。“历史之真”是我们永远无法面对的，但却是我们一刻也不能丢弃的。可能追求“历史之真”只能是一种治学之理念，“历史之真”可能只存在于每个历史学家的头脑中，但是如果丢弃了这个标准，我们就简直无法想象历史研究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姜萌提出的“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大概和我提出的“历史之真”标准有着同样的属性，是一个人们无法真正做到却又不能不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者看到了现代观念和历史语境的背离，而并不奢望历史学家完全地摒弃现代观念意识，只是提醒我们对现代观念意识对其历史书写的影响有足够的警惕。平心而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作者所讨论的中国通史编写范畴，而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治学理路，也有深刻的反省意义。如今的治学，有不少人已经连基本的历史文献都不再阅读，完全凭借极其便利的网络检索手段，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所有资料，而每一段资料的抽取，都已经舍弃了它所在的语言背景（亦即历史场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由无数孤零零的没有历史气息的材料断片的组合，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场域中的任何问题！面对这样的所谓历史研究，真的需要大声断喝：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

无疑，姜萌提出的“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一本研讨性的著作，要涉及诸多问题的评论，所论都要十分确当，那是过分的要求。对姜萌的书也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个人对书中的个别判

断，也不是都能认同。就如他说“六十余年来，除了教科书系列，中国通史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是夏曾佑写于清末的《中国古代史》和钱穆写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这一判断就有可商榷之处。别的不说，单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就很难说值得推崇。一个谙熟中国历史的人，竟然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君主专制制度，把秦汉以后的中国皇权专制判断为是“士人政府”，这样的思想向度，很难令人仰慕！在国学热的喧嚣达到登峰造极的今天，钱穆一类“国学大师”很能赢得一些人的青睐，《国史大纲》的一再刊行，不知道还将贻误多少代人！当然，这也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我也不能用自己的判断去否定姜萌的判断。

一本书的出版，意味着一项研究课题的完成，但同时也应该是一场新的讨论的开启，我希望姜萌的书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可以引起有兴趣的同仁的思考，并促成新的探讨。

是为序。

目 录

引言

第一节 由“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引出的问题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7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16

第一章 “求国家之兴衰何由”

——中国现代历史书写意识的形成

第一节 国家危机与西方历史学初入中国	34
第二节 变法自强与重写中国历史意识的出现	58
第三节 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共同因素的形成	82

第二章 “助爱国思想之发达”

——现代国族意识与中国史书写

第一节 中国现代国族意识的萌生	101
第二节 国族考量与国史书写之酝酿	115
第三节 清末国族史书写模式的主要特点	145
第四节 国史书写在清末的实践及其问题	173

第三章 “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

——种族意识与汉族史书写

第一节 清末汉族种族意识的觉醒	202
第二节 汉族史书写的发轫	214
第三节 清末汉族史书写理论的形成	235
第四节 汉族史书写在清末的实践及其式微	258

结语

在认知与认同的交融中书写中国历史	288
------------------------	-----

附录

乡土意识与国家情怀——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特点及其问题	306
----------------------------------	-----

主要参考文献	328
--------------	-----

后记	350
----------	-----

引言

第一节 由“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引出的问题

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故事，对中国人，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出生的人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即使在山村中像野草一样生长的我，小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的连环画。^①那个时候的儿童，对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非常敬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像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会成为一个问题，并将与我的研究工作发生关联。随着年龄的增大，对岳飞的敬仰与关注也日渐减弱。在此后的读书生涯中，岳飞之所以偶尔被我关注，不再是他抗击金军的勇武，也不是他含冤而死的悲壮，而是历史教科书对他表述的变化。念中学以后，我就发现课本上的岳飞，悄然从“民族英雄”变成了“抗金名将”：

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南下，追击南宋统治者。南宋抗战派将领坚决抵御金军。韩世忠把金军阻截在黄天荡 48 天。抗金名将岳飞收复了被金军占领的建康。^②

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多部颂扬“民族英雄岳飞”的连环画，至于笔者读到的是哪一部，已不记得。当时的庙会上一定有小人书摊，乡村小学门口时常也会有，2 分钱可以随便看。在这些书摊上，有关岳飞的小人书不止一种。

②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第 88 页。

对这种称呼的转变，老师的解释是金和宋的战争，就像是兄弟打架，都是中国内部的事，所以岳飞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①对于尚没有现代族群/国家观念的我来说，这种解释令我很困惑。念大学以后，发现课本中对岳飞的评价与中学教科书也不完全相同：

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南侵的金军，为保卫南方人民的和平生活，免遭女真贵族的奴役和蹂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是南宋杰出的抗金将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②

如果说金与宋的战争仅仅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岳飞又怎么能称为“爱国英雄”呢？难道岳飞可以不是民族英雄，但可以是“爱国英雄”？为何历史教科书关于岳飞的叙述会发生这种变化？

待我踏入历史研究领域后才逐渐明白，在我阅读岳飞大战金兀术连环画很多年之前，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已经是历史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在传统语境之下，岳飞是以“精忠武穆”的面目再现，对其表彰也主要集中在忠义方面。在清末的反满革命运动中，岳飞“民族英雄”的形象开始出现，直至1949年而无大的争论。^③1949年之后，政治、学术语境发生大转换，如何

① 直到撰写此文时，查阅了当时的《教师教学用书》，才明白这种转变的根源所在。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对“课本上为什么只称岳飞为抗金名将而不称为民族英雄”问题有明确的指导：“我们主张把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称为民族英雄。用这一标准，我们称戚继光、郑成功这些历史人物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或我国境内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他们领导人民抵抗来自外国的侵略，而不是我国国内民族之间的压迫。而岳飞，我们只能说代表了当时反抗女真贵族暴行的南、北方人民，在抵抗金统治者的掳掠残杀和对北方经济破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方面，他的抗金活动，他所进行的抗金战争是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但不能说他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因为宋金间的战争是我国内部的民族间的战争，不是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第128—129页）所以，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了。

②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下，第90页。

③ 关于岳飞形象的演变及其意义，可参阅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5辑，第15—41页）等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国家教育主管机关审定的教科书中，岳飞似乎从未被称为“民族英雄”。如1912年民国肇建后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二册（潘武编），并无称岳飞为“民族英雄”。但在民国的一些著作中，岳飞被视为“民族英雄”并不少见，如彭国桢《岳飞评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序”）、邓广铭《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后记”）等。